

19世纪东西方文化紧张的一个理论解决（发言提纲）

A theoretic Solution of the Cultural Tension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高益民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受到了来自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武力的强大威胁，国家主权危在旦夕。中国开始认识到这是一场大变革的开始，十九世纪中后期清政府主要责任者之一李鸿章把它说成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中国在这种情形之下，围绕着是否应该学习西方这一问题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对立的两派。一派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用以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这一派可以看作改革派；另一派的主张是坚持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摒弃一切来自西方的东西，这一派人物后来成为改革的主要阻碍，在历史上被称为守旧派。这两派的对立，反映了中国与西方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

中国的改革派一方面为了反击保守派的主张以促进改革，另一方面又为了应对更激进的主张以保证稳定，开始在理论上系统阐述如何处理学习西方的问题，使是否学习西方、学习什么、如何学习这一问题在19世纪末的东亚得到了暂时的解决。

本文拟对中国等东亚国家在理论上解决学习西方问题加以简要的回顾，对其在教育领域带来的结果加以总结，并对其历史性的影响进行分析和评价。

一、保守派的基本主张与思想方法

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化的大量传入东方早在16世纪就已开始。但是到了19世纪，西方文化传入的情形便起了大变化，它的特征就是西方文化有了军事力量做后盾，这种武力优势成了东亚各国开始严肃地思考学习西方的直接动因。但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一股强烈地排斥西学的思想也随之出现了。

保守派的基本观点和思想方法是这样的：

第一，从西学是敌人之学的角度出发否定西学。这是一种非常朴素的逻辑：西学由敌人所创出，而敌人与我们的立场截然相反，所以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必须反对。清末倭仁的保守思想很大一部分来自他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之所以拒绝西学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列强与我国是敌对关系，向他们学习就是忘记了自己的耻辱。他说：“且夷人事吾仇也，咸丰十年，称兵来犯，凭陵我畿甸，震惊我宗社，焚毁我园囿，戕害我臣民，此我朝二百年未有之辱，学士大夫无不痛心疾首，饮恨至今，进行亦不得已而与之和耳，能一日忘此仇耻哉？”直隶知州杨迁熙也是同样的逻辑。他说：“夫洋人之与中国，敌国也，世仇也，天地神明所震怒，忠臣烈士所痛心，无论偏长薄技，不足为中国师”。

第二，从西学为侵略目的所用的角度出发反对西学。应该说，许多保守思想比较准确地把握了帝国主义侵略的本性，这使他们保持了对西学的警惕。倭仁反对师事夷人一个理由，是他认为“夷人机心最重，狡诈多端，今欲习其秘术以制彼此命，彼纵阳为指授，安积压不另有诡谋？”也就是说，西学有为列强侵略服务的目的，不可轻易相信；即使学习西学，也不可直接以西人为师，以免入其圈套。

第三，从体大而用小、道重而器轻的思维出发，认为修明传统政治、弘扬忠君爱国精神远比吸取西方技术更为重要，认为技工器巧总是细枝末节，而道德信义才是救国根本。清末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认为：“若以自强而论，则朝廷之强莫如整纪纲、明政刑、严赏罚、求贤养民、练兵筹饷诸大端。臣民之强则惟气节一端耳。朝廷能养成民之气节，是以遇灾患之来，天下臣民莫不同仇敌忾、赴汤蹈火而不辞。以之御灾而灾可平，以之御寇而寇可灭，皆数百年深仁存泽以尧、舜、孔、孟之道为教有以培养之也。”大理寺少卿王家璧也指出：“人若不明大义，虽机警多智，可以富国强兵，或恐不利社稷。操用人之柄者，敬舍德而专尚才，从古乱臣贼子，保一非当世能臣哉？”这些言论，表达方式虽有不同，但基本思路都是一致的。

第四，从自民族优异论出发来反对西学。自民族优异论是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中国

自古有所谓“华夷之辨”的思想，即只有中国文明为世界（在当时中国人所了解的世界范围内）上最先进之文明，只有中国人为世界最文明之人民，其他周边国家民族均为野蛮之邦。这种思想在近代竟依然作为守旧派的思想武器。

一、 改革派的基本主张与思想方法

可以说，从确保民族独立和国家主要完整这一角度看，守旧派的出发点是一致的。但是改革派与守旧派所得出的结论完全不同。他们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两点：

第一，为了救国，应该学习西方。

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大门时，当时的知识分子的第一反应便是图谋对抗之法。魏源将林则徐的《四洲志》汇编成《海国图志》一书时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指出学习西方的目的即在对抗西方，为后来的教育发展指出了方向。这在当时也已经算得上惊世骇俗的主张，它不仅影响了中国整个近代的教育思想，而且也成为朝鲜和日本教育改革的先声。

第二，学习的内容主要在于技艺，特别是军事技术。

既然学习西方，那么学习西方什么呢？李鸿章提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用其人”的主张。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这种制器思想，虽然反映了洋务派对西方列强的肤浅认识，倒也并非全无道理。中国蒙受数千年之大辱，直接原因来自于军事上的失利。同时，制器需时短而兴学需时长，欲纾当务之急，无疑需要速效之法。制器之图本意在军事，却求之于教育，于是制器的需要又带动了教育的发展。这种思想所指导的教育改革，使中国先于学制的创设，出现了由政府设立以培养翻译人才为目的的同文馆，继而在地方上又产生了一大批近代学堂。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器思想在中国近代教育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通过教育掌握军事技术以救亡图存，是东亚三国近代时期最为朴素的想法，但却成了近代教育改革的最初动力。不过在近代之初，中朝两国很少有人象佐久间象山那样明确地提出“智力学力”问题，从而使他们的救国方策不免失之短浅，也对后来长期缺乏教育改革的整

体设想不无影响。

三、 解决东西方文化紧张的一种理论尝试

到了十九世纪末，改革派又遇到了两个新的问题。第一，中国在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这表明洋务派自1860年代以来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的道路是条死胡同，也表明其倡导的三十余年的改革运动的破产，那么，改革的道路是否还应该坚持？第二，在国内，要求改变传统的皇权政治、实现君主立宪制的改革势力正在不断增长，他们认为现代化最关键的问题是对政治制度进行改革，这也是他们从日本的成功中吸取到的经验。那么，这个问题如何回答？改革派为了回答上述两个问题，开始了理论上的总结工作。

1898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系统地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回答。在这篇文章中，张之洞首先批判了保守派，强调应当与时俱进。张之洞批评“旧者不知通”，也就是说守旧的人不了解时代的变化，固步自封，“因噎废食”，因此“则无应敌制变”。同时，张之洞又批判了维新派（主张君主立宪的政治改革派）过于激进，强调应当回归传统名教（意识形态），稳步前行。他说，“新者不知本”，也就是说激进派不了解中国的传统精神，浮躁冒进，“歧多亡羊”、因此“则有菲薄名教之心”。

在对守旧派和激进派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张之洞阐述了他关于如何处理中国传统与西方学术之间关系的基本主张，其基本口号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在坚持中国传统学术、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的前提下，采用西方学术中 useful 之处进行补充性地学习。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一直有“道”“器”之分和“体”“用”之辨。二千多年以前的《道德经》就曾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论述，即是说，那些超越一切具象而有形的那些抽象的、无形的本质“道”，而那些具有物质特性的则为“器”，器是道的物质化、现实化与具体化。而“体”和“用”的意思亦与此相类似，“体”是指本体，是蕴含于世界万物中的本质；而用则是体在现实世界中表现出的功能。

由于中国传统对于这两个概念的看法是，体的重要性远远大于用，因此也就可以看出，

“中体西用”思想在字面上突出了中国传统价值观、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重要性，而降低了西方学术、西方制度的重要性。如此以来，它就可以免遭守旧派的攻击。

但实际上，提出“中体西用”思想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解决学习西方的问题，它虽然表面上把西学只放在用的位置，但却为西学的引入确立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为进一步的政治改革留下了余地。如张之洞在谈到是否要建立议会政治时，谈到“此时欲开议院，其如无议员何？此必俟学堂大兴，人才日盛，然后议之，今非其时也。”

“中体西用”论的提出，使19世纪一直存在争议的是否要学习西方、学习什么、如何学习的问题在理论上暂时得到了解决。

四、“中体西用”思想对教育上的影响

“中体西用”思想虽然是在1898年才得到了最完整的总结，但实际上自1860年代开始，改革派就一直在不自觉地实践这一思想。这种思维方法在教育上有什么影响呢？

第一，重补救措施，轻制度建设。

中国的教育虽然在1860年代就开始进行了改革，但是的来说是补救性的，而没有进行制度建设。

当时中国设立的西式学校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外语学校，如京师同文馆（1862），广方言馆（上海，1863）、广州同文馆（1864）、湖北自强学堂（1893）年，这些学校主要学习外国语，培养翻译人员。第二类是军事学校，如福州船政局附设船政学堂（1866），操炮学堂（上海，1874）、天津武备学堂（1885）、江南水师学堂（1890）、军医学堂（1893）、江南陆师学堂（1895）等等。第三类是技术学堂，如电气学堂（福州，1876），电报学堂（天津，1880）、电报学堂（上海，1882）、采矿工程学堂（武汉，1892），山海关铁路学堂（1895）、南京矿务学堂（1898）等等。

尽管清政府建立了如此之多的现代学校，但在19世纪，中国一直没有出现近代教育制度。

第一个学习日本而制定的近代学制是1902年才提出的，从第一所近代学校京师同文馆的设立到第一个近代学制的诞生，整整花了40年时间！

第二，重技术教育，轻科学教育。

曾在清末长期倡导引进西学的梁启超在1922年回忆说：“中国人因为始终没有懂得‘科学’这个字的意义，所以五十年前，很有人奖励学制船学制炮，却没有人奖励科学。近十年学校里都教的数学几何化学物理，但总不见人做科学。”在洋务教育改革中，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当然也包括科学，但有一种与技术结合在一起并为技术而服务的倾向。

如果说当时东亚完全不重视科学，那么恐怕也过于武断。当时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很多人已经开始朦胧地认识到了科学的重要性，留学生派遣事业、译书机构的设置等都与对科学知识的向往有关。这里所强调的，是当时对科学的注重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具体技术的展开，以留学生为例，很多人在回国之后开始倡导科学教育，表明他们对科学的认识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这主要是留学期间系统的西方学术训练使然。

第三，重国家主义，轻个人主义。

洋务运动中，在革新派的倡导和支持下，建立了为数众多的近代学堂，完全服从于国家目的之下，很多学堂由国家直接掌握。戊戌变法时，一些维新人士提出仿效日本和德国的学制建立近代教育制度，都含有加强中央集权、导入国家主义教育的因素。梁启超虽然倡导过民权，但在接触了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以后，他转而认为“昔谓国家恃人民而存立，宁牺牲凡百之利益以为人民者，今则谓人民恃国家则存在，宁牺牲凡百之利益以为国家矣。”1902年梁启超发表《论教育当定宗旨》和《新民说》，要求明确把教育看作是“制造国民之具”，并呼吁把这一国家主义教育观念作为教育宗旨确立起来。1906年，学部在奏请厘定教育宗旨时，正式提出了“忠君”一条，奏折充满了对德国和日本国家主义教育的推崇之意。同时，学部的奏折还提出“尚公”一项，认为“爱国合群”和“爱国如家”也都是必须提倡的美德。国家主义教育宗旨提出的时候，清朝已是强弩之末，因此实际上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实施，但这一思想却被民国所继承。在1912年召开的临时教育会议上，刘以钟等人提出的《请决定相对的国家主义为教育方针案》被接受，其后蔡元培提出的教育宗旨中又特别强调了

“军国民教育”，1915年袁世凯的《颁定教育要旨》把清末的“忠君”改成“爱国”。

但是，清末洋务派的教育改革首先是从为国家培养人才的角度谈教育的。1872年曾国藩和李鸿章二人接受容闳建议而倡导留学事业，在给同治帝的奏折中鲜明地提出了“作育人才，力图自强”的观点。奏折认为留美幼童“虽未必皆成伟器，而人材既众，当有瑰异者出乎其中，此拔十得五之说也。”可见，这里的“人才”，完全是指精英秀异者而言，指望的是“拔十得五”，显然不是从大众教育的角度出发的。盛宣怀1895年奏请设立天津中西学堂时说：“伏查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设立学堂为先。”这里的人才也是指特殊才用，而不是指一般民众的才智。

一直到20世纪，中国都没有出现从个人权利的角度来论述教育的思想家。

结论与讨论

“中体西用”思想，是东亚传统思维方式在迎接来自西方的近代化冲击的过程中的一种反应，它不止于中国，而且在日本和朝鲜都有类似的主张，在日本，谓之“东样道德，西洋艺术”（后来演变为“和魂洋才”），而朝鲜则谓之“东道西器”，其基本思路是大同小异的。这种主张弱化了守旧派的拒不吸收西方文化的主张，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但也同时也拒绝在精神领域和政治制度领域更多地吸引西方，因而又具有落后与保守的影响。在日本，儒学成为军国主义的思想武器；在中国，儒学成为共和制后复辟帝制的理论依据；在朝鲜，儒学也为闭关锁国思想提供了温床。随着历史的发展，它的局限性也日益突出了。

作为一种思维惯性，在20世纪，中国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种思想方法，理解这种思想方法，是了解中国教育现代教育发展的一把锁钥。